



舟、鱼、蛙与 水之关系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政体》

粗读《贞观政要》有关舟水关系的论述，主要有两处：一在《政体》，一在《君臣鉴戒》；一在贞观六年，一在贞观十四年；一为“古语云”，一为“孙卿子曰”。两处均见于魏徵给唐王的奏折中，引文大致差不多。意思也较为浅显：国君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当然，这个意思，在魏徵的《十思疏》中也有表述：“载舟覆舟，所宜深慎。”^①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之为“舟水关系”，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一些有识之士朴素的民本思想。孙卿子（即荀况）是战国时人，比他更早一些的春秋时代的齐国政治家管仲曾经作过

^① 《贞观政要·君道》

更为准确的描述：“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①不知这是否荀子“舟水理论”的思想嚆矢。

李世民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乱世”中夺得政权的，他亲眼目睹了民众在改朝换代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巨大威力，从而深深地产生了对此种伟力由衷的敬畏。魏徵作为同一时期另一股政治力量帐下的幕僚，当然也懂得这层道理。这就是在隋末唐初这个特定时期，这个话题被反复提及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因素。

“舟水之论”反映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能看到二者之间的统一性（依赖、互动）这固然体现了中国早期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睿智，然而从阶级本质和经济基础来看，这种“舟水关系”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的倒是它的对立性质。我以为，这就是前贤先哲总在“载”与“覆”上作文章的思想底蕴。

苍狗白云，斗转星移。同样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社会分工而言，尽管仍然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野，但是从根本上说，已经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在这个社会里，原则上说来，官员与公民，干部与群众，尽管在哲学上仍然是对立统一关系，但矛盾的根本性质和主导方面，主要体现在统一这个层次。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个非常通俗的表述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然还有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等种种说法。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新时代的干群关系，应当是彼此不可分离的鱼水关系，而不至于出现“覆

舟'关系。梁衡的散文《红毛线 蓝毛线》描述了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他说 在战争时期 党和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鱼水关系。“西柏坡坡下有水 有稻田 毛泽东是从小干惯了稻田活的，工作之余就挽起裤腿去和农民插秧。朱老总一脸敦厚，在村头背着手散步，常被误认为是下地回来的老乡。任弼时全家人睡的土炕上至今还放着一辆纺车。领袖们走过雪山草地 大都到过东洋西洋 他们统率千军万马 熟悉中国的经济，遍读经史子集和马恩列斯 他们知识渊如海 业绩高如山 但是他们却这样自自然然地溶在革命队伍中，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分子。’^①

其实 鱼水关系 并非今人的创造 能够查到的根据仍是《贞观政要》。在《君臣鉴戒》一章中 有魏徵引孔子的一句话：“鱼失水则死 水失鱼犹为水也。”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不过，这个比喻的深层含义并非是说皇帝与平民具有什么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它所揭示的道理在于，“鱼”离开了水就是死路一条 而水仍然还是水。这与“舟”可能的“载”与“覆”都不可能改变水的地位与性质是一样的。这似乎是对一种不可知力的恐惧，也正好说明旧时开明君臣对人民的伟大力量的油然而敬畏。

似乎与时代的进步构成了一种反差 当今时代，一些本来处于“鱼水结构”中作为“鱼”的角色的扮演者的领导干部 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即由“鱼”进化“为”蛙”。这种“进化”似乎并不像从水生脊椎动物到水陆两栖动物那样简单。鱼生有水中呼吸的器官——鳃，来吸收水中的氧气，一旦脱离了水，鳃

就不能发挥作用 鱼就会窒息而死。“涸辙之鲋”哀求庄周道：“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①即说明鱼离开了水，就会大难临头。而蛙则不然——除开蝌蚪阶段——蛙的鳃退化而为肺，于是可以到陆上呼吸，必要时也可下水。于是蛙被名之曰“两栖”。自然界的现象无所谓对错。奇怪的是，阉浮世上，一些背着“共产党员”招牌的领导干部，也完成了这种从鱼到蛙的“进化”。这种“进化”的实质是淡忘了“公仆意识”，脱离了“鱼水关系”。其表现则是从实用主义出发，采取了青蛙对待水的态度：需要时跃入水中，不需要时则跳到岸上。比如说，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热衷于“上午乘着车子转，中午围着桌子转，晚上搂着裙子转”，早已习惯了“岸”上的生活。再比如，有些领导者临近选举或上级考察，他们就极不自然地放下架子，摘下脸谱，搁下官腔，这里和颜，那里悦色，此处嘘寒，彼处问暖，仿佛他原本就是水生动物，殊不知等选票“到手”，乌纱“戴定”，就又跃出水面，钻入轿车，只闻得“酒席筵上说丰盛，听取蛙声一片”了。^②

“鱼水关系”较之“舟水关系”，无疑表明了历史的进步。然而，从“鱼水关系”到“蛙水关系”，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退化，将此称之为退化似乎更为确切。在今天，各级领导干部都应珍视和保持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鱼水关系，关心群众，勤政为民，不作青蛙岸上叫，要作鱼儿水中游，如同安泰落回大地，才能真正获得力量。

《庄子·外物》 ② 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句，改其意而用之。

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

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辨兴亡》

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对时为黄门侍郎的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很多百姓都饥饿困乏。虽然国家的粮仓很满，杨坚竟不允许开仓救济，却让百姓逃荒到有粮食的地方自己找饭吃。隋文帝不爱百姓，只惜仓库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于到他死的时候，国家储积的粮食，竟可以供给全国的百姓吃五六十年……凡是治理国家的，务必积蓄于民，而不在于装满国家的仓库。古语云：‘如果百姓的用

度不够 国君的用度怎么会够？”后面这句“古语云”出自于《论语·颜渊》，是圣徒有若先生回答鲁哀公的话。

在中国，有一个思维传统，确认一个观点的正确与否，往往不是根据实践的检验，而是先确定是否来自于权威或来自于圣贤。我之所以看重这句话，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个例子可能会对于一些领导者的某些观念带来根本性质的拨乱反正。哪种观念呢？那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观念在我国比较流行。一些领导者确信并传播这种观念，当然可以有公开的或隐讳的、光明的与阴暗的各种理由，即使这样做可能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创造政绩，树碑立传，但在公开场合却是教育下属与百姓要“顾全大局”，努力奉献”。

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为本位的国度，且不说集体主义本位与个人主义本位有什么优劣之分，但有一点必须肯定，在通常情况下，强调集体利益，不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思维方式，所体现的正是—种集体与个人的对立，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片面强调集体利益，而个人利益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或干脆不存在的理由或忽略不计或使之泯灭或予以消灭。

如同朱元璋修改《孟子》，某些思想家和领导者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口号下，不知怎么单单就把这一条遗忘了。对于这样一条由圣贤立言因其见之于《论语》)由权威倡导因系李世民重申的“传统文化”无论如何比之于上述的“大河小河论”更接近于辩证法。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个提法与“大河小河论”其实是对立的。这种提法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如果用“大河小河论”

这种句法来套的话，应当是这样一种格局：“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对于这样一种客观地反映了自然界基本事实的说法，可能是一些仍然抱着尽管歪曲了自然规律但仍被奉为圭臬的思想观点的领导者所无法接受的。因为这的确牵扯到一些领导者所谓‘主人’与‘公仆’真实地位的互变从而使自己失去向下属和百姓进行教育和灌输的一个基本论据与手段。

其实，这个思想也不仅仅属于有若先生，当然更不属于李世民。如果将这个思想通俗化为“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的话，那么在庄子则有“江河合水而为大”^①，在荀子则有“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②，在墨子则有“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③，在李斯则有“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④；《后汉书》则有“涓流虽寡，浸成江河”^⑤。举出这许多例子的目的，无非在于使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真正了解大河之水是由小河之水汇聚而成的，国家的富强是以百姓的富足为前提的。“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如果将其中的‘君’替换为‘国’所表述的也仍然是这个道理。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君即朕，“朕即国家”。确立这样一个基本的哲学观非常重要，它有助于从我们的领导科学的词汇中彻底剔除“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以颠倒因果、歪曲事实为特征的思想观念。

在我们的国家里，要确立一种观点是否正确，还有一条“捷径”，那就是从马恩著作中寻找根据。辩证哲学的三大规律中有量变质变规律，即只有量的积累才会产生质的飞跃。

①《庄子·则阳》 ②《荀子·劝学》 ③《墨子·亲士》 ④《谏逐客书》
《后汉书·酷吏传》

而量的积累本身，又有一个从多到少、由小到大的过程。这就有必要让人们认清，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里，“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实际上背离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却又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当真理炫耀。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所有的领导者都不清醒，这里有许世友将军的一则故事。5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最后一次回故乡看望当时衣着褴褛、年过七旬的老母亲。离家之前，当地的党政官员请他谈谈对家乡的感受和要求。他板着黑沉沉的脸说：“连老祖宗都知道，民富才能国强……你们说什么‘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大河里无水小河里干’，糊涂虫，应该颠倒过来，‘小河里有水大河里满，小河里无水大河里干’。”有人轻声反驳：“我们是讲锅里有，碗里才有。”“锅里有？锅里的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老百姓碗里挖来的。咱们共产党，从什么时候学会了自己骗自己？不要为了邀功升官，坑害百姓！”^①这就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高风亮节。在这一点上，“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才得到了正确而深刻的诠释。

① 《南方周末》第 603 期

贵 顺 物 情

贞观元年 太宗谓使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 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 用人力极广 而无怨 黷(dú)者 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 而人多谤议者 为徇其私欲 不与众共故也。”

—— 《俭约》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对侍臣说：“自古以来 帝王们凡是要兴建工程，必须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开凿九山，浚通九河，耗费人力非常巨大，却没有人痛恨埋怨，因为民心希望这样做，他集中了百姓的意愿。秦始皇营造宫室，人们常常指责批评 因为他是为了满足私欲 与民心不一致的缘故。”在这段对话中 所反映的思想 至今看来 也还是有价值的 那就是对“贵顺物情”有意或无意的崇尚和追求。“物情”也者 据《辞源》解释，1.物理人情。2.众望，人心归向。因此，这句话通常

可以理解为“重视顺应民心”。

李世民在这段议论中，采取了正反对比的手法，以说明“贵顺物情”之重要。同样是兴建工程，同样要耗费民力，大禹凿九山、通九河，但百姓并没有怨言；而秦始皇造宫殿、修陵墓，却搞得民怨沸腾。那么，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这是因为前者是“物情所欲，众所共有”，而后者则是“徇其私欲，不与众共”。就是说，前者顺应了人民的意愿，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而后者只为满足个人的私欲，背离了人民的意志，因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

历代帝王往往过分相信自己的“天纵英明”，迷恋自己的“君权神授”，这种九五之尊、天下一人的心态和地位，使之产生了错觉，似乎只有权力才是一切，以致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段，看起来好像不可一世，然而从历史长河的整个过程来看，个人不过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尘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在社会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盛衰兴亡，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看问题，倒是“顺民者兴，逆民者亡”。这从李世民反复提及的秦始皇和隋炀帝那里可以得到明证。

李世民这个思想，在其子孙那里，多多少少还是得到了贯彻的，比如李隆基、李昂等等，不然有唐一代也不可能延续达三百年之久。在这里，尤应一提的是陆贽这个人。唐德宗（李适，建中四年（783年））有一位后来成为丞相并被后世称之为政论家的陆贽先生。有一次，皇上李适问陆贽“以当今切务”，陆贽认为：“当今切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即治。唐代避高宗李治讳，以

治为理 乱之本 系于人心 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 在危疑向背之际 人之所归则植 人之所去则倾 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 同其欲恶 使亿兆归趋 以靖邦家乎！”^①陆先生这段话，文字上没有什么生僻之处，可无需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审查群情”、“同其欲恶”等语 都是“贵顺物情”的意思 其主旨也就是要求即使是皇上这种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也要重视人民的意愿。

在这里还有两句作为背景的用语，即“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陆贽在说这话时，其时代背景大致是这样的：由于边臣叛变 京城陷落 致使皇上“乘舆播迁”。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形势，才有这样一种认识吧！历史上的确不乏这样的先例，在生死未卜的创业时期，领导者往往显得开明通达；而在歌舞升平的守成年代，有些领导者往往显得愚昧昏聩。不知这是不是一种历史的通例。

在我的感觉里，199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国家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如前苏联东欧剧变，国内政治风波等，大概也可以称之为“变故动摇之时 危疑向背之际”的。当此之际 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决议 也就是此时 我曾以陆贽这番议论为引子 写过一篇《去民恶 行民欲》。当然 无论是李世民的“贵顺物情”还是陆贽的“同其欲恶”与今天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都不是一码事。研究历史问题 借鉴历史经验 不可滥加比附 毕竟时移事易 而且事易人异。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的改变，有的人不仅忘掉了

《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基本宗旨 当然更谈不上“全心全意”有的人甚至也已放弃了“贵顺物情”这种最起码的道理。“物情所欲 众所共有”他们是做不到了，反而热衷于如同秦始皇一样的“徇其私欲，不与众共”了 什么金钱贿赂 什么华堂美屋 什么公款饕餮 什么豪华轿车 这类为“物情”——民意——深恶痛绝的丑行 恰恰是他们苍蝇逐臭般所竭力争取的东西。流传于群众之中的“新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虽语涉调侃偏激，但总是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

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 米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 衣的问题 生小孩子的问题 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①只有这些问题做好了，才有资格让群众发扬“奉献精神”树立“大局意识”。只有什么时候将“企业有困难 职工怎么办”“政府有困难 群众怎么办”这样的口号 颠倒过来 变成“职工有困难 企业怎么办”“群众有困难，政府怎么办”，并切切实实付之于行动，群众才会真正树立起“大局意识”发扬“奉献精神”与各级领导者一起 群策群力，艰苦奋斗，风雨同舟。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 割股啖腹 ” 说

贞观初 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 必须先存百姓 若损百姓以奉自身 犹割股以啖腹 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 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君道》

贞观初年 李世民对臣下说：“作为国君之道 必须先保有百姓。假如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如同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自己的性命也就完了。如果想安定天下，首先要自己行为端正，没有身子正而影子歪、上边得到治理下边反而混乱的。”

“割股啖腹”的故事 我最早见之于《东周列国志》。晋公子重耳逃亡国外，困乏饥饿。其随员介子推割自己大腿上的肉为重耳的辘辘饥肠解决了一点实际问题。后来重耳作了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介子推的“割股啖腹”是割自己之肉而供他人之腹。与本

文所说的“割股啖腹”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本文所指是割己之股供己之腹，带有明显的自残性质。这是就字面理解，另一层不同则是“割股啖腹”只是一种比喻，强调了“民为邦本”的辩证关系。

不知是因为版本不同，还是因为传抄有误，不知是因为吴兢《贞观政要》的作者功底稍浅，还是因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作者水平较高，相同或近似的意思，我总觉得这段论述没有《资治通鉴》中的叙述来得精辟。试录原文如下：“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①

在李世民这段“最高指示”中，实际上蕴涵着“民”、“国”、“君”这样三种概念。尽管在这一点上，《贞观政要》不如《资治通鉴》表现得那么明确，但其原文中的“君”、“百姓”与“天下”三个概念则是与此相应的。李世民这段议论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封建皇帝，首先承认国家是君王之本，而百姓又是国家之本。没有国家当然没有君王，没有百姓也就没有国家。明白了李世民所阐述的这层道理，才能准确地把握他的“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以啖腹”或“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的思想内涵。李世民不是一个历史唯物论者，他当然认识不到民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但他的“刻民以奉君，则君富而国亡”的观点，仍然闪烁着这位古代政治家素朴的民本主义的思想毫光。

李世民在对他的“割股啖腹说”作了抽象的概括之后，还进一步作了具体的阐发。在这一点上，《贞观政要》的阐述仍

然要比《资治通鉴》逊色。在这里姑从后者。在李世民看来，一些官员崇尚奢侈、追求奢华的欲望，大抵是自古而然的。鉴于“刻民以奉君”有可能导致“君富而国亡”的深刻见地，他指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①排比递进，凌空而下，直逼骨髓。追求享受的欲望由“刻民”开始，以“丧君”告终，导致这个黑色过程的罪魁祸首正是难填的欲望。“刻民”必然“损国”，“损国”必然“丧君”，这不仅构成了历代王朝递相兴亡的政治生态链，而且也构成了整个中国史政治周期率的关键环节。周而复始，可悲也夫！

如果说李世民所谓“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政治结构理论只是民本主义思想之微光的话，那么，在今天，在一个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度里，应当如何看待人民、国家、干部三者之间的关系呢？对于各级领导者说来，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然而，常识性的东西有时又十分富有真理性。当一个领导者崇尚“官本位”观念，处处以“救世主”的身份凌驾于人民之上时，当一个领导者以“上智”的角色自居，而将人民看作“下愚”，随时扮演一副好为人师的姿态时，当一个领导者忘记“社会公仆”的身份，以“社会主人”的面目肆无忌惮地向社会索取时，当一个领导者成为“权力拜物教”的门徒，运用手中权力竭力满足私欲时，当一个领导者堕落为“社会蛀虫”，大肆蚕食民脂民膏时……在这些当代领导者那里，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比李世民的“民本主义”更可爱。“刻民以奉君”则“君富而国亡”，这里虽以“割股啖腹”喻之，却蕴涵着十分深刻

的政治见解。从“刻民”到“亡国”，再到“丧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现实社会中，对一些以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见饵即食、不计后果的腐败了的领导者说来，他们还够不上“割股啖腹”的哲学高度，他们充其量只是一些没有社会责任心、缺乏历史沧桑感的行尸走肉。

“割股啖腹”绝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贬义语，当一个领导者真正意识到人民是社会的基础、国家的主人时，他就会永远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是必须维护的，至少是不能损害的。按照“割股啖腹”的理论，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就损害了社会之根、国家之本，到头来，损害的正是他自己。尽管受损害的自身较之同样受损害的国家和社会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由此却可以确认一个信念：一个领导者只是一片树叶，而人民才是大树本身。人民的利益是不能损害的，因为，自己原本就来自于人民。

张玄素的论据

今玄素上表 洛阳实亦未宜修造 后必
事理须行 露坐亦复何苦 所有作役 宜即
停之。然以卑干尊 古来不易 非其忠直，
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谏
诤。可赐绢二百匹。

——《内制》

这是一则通过接受下属的批评意见，从而避免了一起盲目决策的故事。这则故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表现了张玄素此人为了维护百姓利益，毅然决然地上书最高领导者的决心和勇气；二是体现了最高领导者李世民终于接受批评的气度和胸怀。

文前引用的这段话，是李世民对张玄素的褒美之词，意思是说，有张玄素上表，看来洛阳宫的确不应重建，如果需要，以后必须按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即使露宿又算得了什么？所有建造和调派民工的事情应当立即停止。然而，以地